

“四人帮”罪行录

(报刊资料摘编)

第二辑



福建省图书馆大批判组 编

毛主席语录

一九七四年三月二十日，毛主席曾经十分愤恨地批评江青：“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

毛主席严厉批评江青说：“放屁，文不对题”。并明确指示：“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

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

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的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

目 录

一	疯狂反对马列主义	(1)
	篡改攻击毛泽东思想	
二	造舆论放谣言四出活动	
	搞阴谋施诡计算党夺权	(30)
三	迫害毛主席 分裂党中央	
	陷害周总理 攻击华主席	(55)
四	从党中央到地方四处插进黑手	
	妄图打倒一大批党政军负责同志	(70)
五	肆意破坏工农业生产	
	不管人民群众的死活	(95)
六	破坏无产阶级革命文艺	
	贩卖封资修 反动货色	(108)
七	腐朽糜烂的生活作风	
	反动透顶的人生哲学	(135)

“四人帮”罪行录

(一) 疯狂反对马列主义 篡改攻击毛泽东思想

△在政治上，“四人帮”肆意封锁、对抗和篡改毛主席的指示，干扰和破坏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在国际国内一系列问题上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他们反对毛主席制定的党的基本路线，违背毛主席关于修正主义是主要危险的教导，把经验主义作为当前的主要危险，提出要把反对经验主义“当作纲”，来代替以阶级斗争为纲。毛主席曾批评他们：“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經驗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項，放过另一項。”“我看批判經驗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經驗主义”。“四人帮”违背和篡改毛主席的指示，反对和破坏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他们反对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破坏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针，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他们篡军乱军，破坏军队建設和民兵建設，妄图毁我长城。他们崇洋媚外，里通外国，大搞投降主义和卖国主义。他们搞的这一切，都是为了篡党夺权。毛主席逝世之后，他们加快了步伐，炮制“按既定方针办”的所谓毛主席的临终嘱咐，发出了反革命的动员令，阴谋策划推翻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妄图取而代之。

在思想上，他们用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代替唯物论和辩证法，毛主席曾尖锐地批评他们：“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

他们在思想文化各个领域肆意歪曲马克思主义，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政治和经济、革命和生产、红与专等一系列的问题上，制造混乱，以售其奸。他们利用手中控制的舆论工具，歪曲事实，颠倒是非，制造谣言，欺骗群众，为篡党夺权大造反革命舆论。“四人帮”在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个方面全面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在组织上，他们结党营私，大搞宗派主义、分裂主义。毛主席多次批评他们：“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的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但他们阳奉阴违，变本加厉，在党内自成体系，为所欲为，称王称霸，把自己凌驾于毛主席、党中央之上。他们大搞“突击入党”、“突击提干”，封官许愿，拉拢黑班底，疯狂进行“组阁”活动。他们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破坏党的优良传统。他们大开“钢铁工厂”和“帽子工厂”，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对怀疑、不满、抵制他们那条错误路线的同志，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们歪曲和反对毛主席提出的革命接班人的五项条件，破坏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制造新老干部的对立，既打击了老干部，又损害了中年干部和青年干部。他们的黑手伸到哪里，哪里就引起分裂、混乱和武斗，哪里的革命和生产就遭到破坏，资本主义就泛滥，反革命活动就猖獗。他们起到了公开的阶级敌人所起不到的作用。

（《人民日报》一九七六·十一·十八）

△《万水千山》剧组在毛主席、周总理的关怀鼓舞下，坚决遵照毛主席的指示进行修改、加工。他们日夜加班，花了几个月时间修改、排练，于一九七四年七月二日——毛主席观看《万水千山》十周年纪念日再次进行内部实验演出。这时，剧

组多次要求江青、张春桥等人和文化部负责人前来审查。但是，这伙阴谋家、野心家拒绝看这个戏。江青扬言：“不改好（不按照她的意见改）不看”。一九七五年一月，江青见到作者时又训斥说：“你这个人不听话，叫你改几句台词都不行！”作者告诉她，那些地方都是毛主席肯定的。江青便气势汹汹地说：“毛主席看过的肯定的也可以改嘛！”反革命气焰嚣张到了极点。

（《人民日报》一九七六·十二·十二）

△江青既不让《创业》创作和拍摄人员参加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也不让大家去参观英雄的大寨大队。她自己每天骑马、拍照、吃喝玩乐，大放厥词，造谣中伤，疯狂攻击党中央，攻击毛主席，攻击周总理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大肆散播分裂党中央的无耻谰言。她还极端反动地攻击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无耻地吹嘘自己说：“马克思死了没有留下什么，我还留下二十几个戏”。

（《南方日报》一九七六·十一·二十三）

△大野心家、大阴谋家江青对毛主席怀有刻骨仇恨。一九七四年六月，她去小靳庄时，群众高呼“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她恶狠狠地制止群众说：“不要喊这个，咱们不要学林彪那一套。”看！寥寥数语，暴露了江青反对毛主席的凶恶嘴脸。

（《天津日报》一九七六·十一·二十九）

△“四人帮”为了对抗毛主席的建军路线，破坏我军光荣传统，跑到部队横加指责。什么东西反映了毛主席的建军路线，继承和发扬了我军光荣传统，他们就向什么东西开火。

大野心家、大阴谋家江青到我们连队，横挑鼻子竖挑眼，鸡蛋里头找骨头。我们连队认真贯彻中央军委颁发的《内务条令》、《纪律条令》、《队列条令》，在地震以后从工作到生活及军容风纪各方面都比较好。可是，江青却看不惯，这也指责，那也训斥。当听说我们是按照新条令办事时，就恶狠狠地骂道：“邓小平就净抓条令”，拍着屁股气冲冲走出去了。新条令是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批准的，中央军委决定颁发全军试行的。新颁发的条令，突出了毛主席的建军思想、建军路线，突出了我军在战争年代的光荣传统以及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新经验，突出了“三要三不要”的基本原则。江青为了把它一刀砍掉，妄图以批邓为名，否定新颁发的条令。手段的卑鄙表明他们目的的卑鄙。

（《天津日报》一九七六·十一·二十）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对浙江和八个厂的情况十分了解，他老人家在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重要指示中，亲自给杭丝联那个坏人定了铁案。但是，“四人帮”却要为这个坏人翻案。他们狗胆包天，竟把毛主席指示中那个坏人的名字勾掉。王洪文早在去年十一月就垂头丧气哀叹：那个坏人“被他们抓住了，没有办法”。今年五、六月间，王洪文又气势汹汹地责问有关人员：材料实不实？“四人帮”之所以竭力为这个坏人翻案，是出于他们篡党夺权的需要，他们要找这样的坏人作为他们的“先进分子”来依靠。杭丝联的同志揭发，张春桥在“十大”以前就说过，这个坏人“有才干”，“要培养”。他们不顾杭丝联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党员群众的强烈反对，让这个坏人当上了“十大”代表。一九七四年六月，王洪文打电话给省委，要让那个坏人列席省委常委会议。伟大领袖毛主席洞察一切，亲自定了这个坏人的铁案，粉碎了“四人帮”的罪恶

阴谋。

(《浙江日报》一九七六·十一·廿八)

△我们热爱和崇敬周总理，敌人害怕和仇视周总理。“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千方百计攻击、陷害周总理。那个狗头军师张春桥在一九七二年的一次团干部座谈会上就信口雌黄，诬蔑毛主席关于“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的指示是“形而上学”，胡说“学生中没有一个三好的”，明目张胆地把矛头指向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指向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公然往红小兵的脸上抹黑。

(《文汇报》一九七六·十二·二)

△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张春桥在上海一次青年工作座谈会上竟然胡说什么：“目前还缺少团的经验，毛主席至今还没有批过一个团的文件。”这个利令智昏的大坏蛋公然把毛主席对青年工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一笔否定，把共青团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成长起来的历史统统勾销，似乎现在应该由他来总结团的经验，批发团的文件、指示了，狂妄地把自己凌驾于伟大领袖毛主席之上，这充分暴露了他们一伙篡党夺权的狼子野心。

(《文汇报》一九七六·十一·十八)

△今年二月，反革命阴谋家、野心家江青就把毛主席对“四人帮”的批评，诬蔑为是使她“头痛”的“紧箍咒”，狂叫什么要“奋起千钧棒”。反党分子张春桥在毛主席逝世后不久，就恶狠狠地对他的亲信说：“人家已经讲我们是‘上海帮’了！”矛头直接指向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

(《北京日报》一九七六·十一·十四)

△她（江青）在解释毛主席一条重要指示时，信口开河，胡说八道，连她自己也不得不说：“主席要是还在世，又该骂我了，不让我这样说。”这就露出了她背叛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丑恶嘴脸。

（《北京日报》一九七六·十一·十九）

△江青三次窜来榆林时，在多次谈话中，从来不说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丰功伟绩，根本不提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巨大威力。相反，她极力贬低毛主席，拼命往自己的脸上贴金，大肆吹嘘自己。她经常恬不知耻地胡诌什么：“文化大革命是我掌握方向，掌握政策”，“造反派头头就听我的话”。她还吹嘘：“文化大革命中我废寝忘餐地工作，把身体搞垮啦！”等等。尤其令人憎慨的是，她还别有用心地捏造什么文化大革命中，中央领导同志都不支持她，甚至迫害她，丧心病狂地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向敬爱的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

（《南方日报》一九七六·十一·二十一）

△几年来，大野心家江青曾先后三次窜到榆林港，大放其毒，作恶多端。她极端仇视我们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她在军队没有任职，却到处招摇撞骗，妄图插手军队，分裂军队，毁我长城；她游山逛水，恣意作乐，过着极其糜烂的资产阶级生活。榆林港军民对她的所作所为，早就看在眼里，恨在心头。在揭发批判中，广州部队榆林要塞区党委成员义愤填膺地声讨大野心家江青极端仇视我们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累累罪行。他们说，江青口口声声“代表毛主席”，处处声称她是毛主席的“学生”、“战友”，可是她从来不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还别有用心地说“一看书我就头痛”。更为可恨

的是，她下令在她住的房子里不准挂毛主席的像，不准张贴毛主席语录、诗词。有一次，她到高炮三连照相，竟以什么“破坏画面”为借口，恶狠狠地下令将毛主席的语录牌拔掉。她窜到四连进行所谓“视察”时，干部战士向她汇报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的情况，她却闭目养神，根本不听。当大家高唱毛主席曾倡导唱的《国际歌》时，她却摆手制止。江青照相专门照晚霞、落日。当时有位同志劝她照朝霞，她却恶狠狠地说：“我从来不照朝霞，我就是要照晚霞！”含沙射影地攻击我们心中永远不落的红太阳毛主席，真是罪该万死！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江青在恶毒攻击毛主席的同时，极力为自己树碑立传。她指使其亲信大肆拍摄她所谓“深入群众”的照片，强令为她个人设立“陈列馆”，对她歌功颂德，真是丑态毕露，令人作呕。

(《南方日报》一九七六·十一·二十一)

△江青这个害人精，不仅不执行“在进行辩论的时候，要用文斗，不用武斗”这个政策，而且明目张胆地反对这个政策，破坏这个政策。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二日，江青竟对一个群众代表团说：“我们不能天真烂漫，……‘文攻武卫’这个口号是对的”，“你们不要放下武器，我支持这一点”。反革命野心家王洪文还大打出手，亲任“文攻武卫”的总指挥，带领群众去武斗。

(《广西日报》一九七六·十一·十七)

△在文化大革命的这个关键时刻，全国亿万群众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纷纷实现了革命大联合。面对这个大好形势，江青破坏文化大革命之心仍然不死。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她对首都文艺界讲话，一不讲正确对待干部，二不讲革命大联合，

三不讲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而是说什么“目前……有的单位还要乱一下”，要“不怕乱，顶得住”。江青在这时候跳出来叫嚷要乱，要顶住，她究竟要乱谁，要顶谁，不是很清楚吗？她要顶的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要乱的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直到一九六八年二月，全国已有十多个省、市、自治区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他们一伙还想图推翻各省、市、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四人帮”中的文痞姚文元，舞文弄墨，打着“革命”旗号心怀鬼胎地说：“在我们国家中，不允许存在与毛主席司令部相对抗的任何大的或小的‘独立王国’。”这是一番人面鬼话。刚刚成立的革命委员会，怎么一下子又变成对抗毛主席司令部的“独立王国”了呢？！说穿了，他们就是唯恐天下不乱，企图把水搞浑，从中把大批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领导干部打倒，自上而下地组织他们的小山头、小宗派，为篡党夺权做组织准备。

（《广西日报》一九七六·十一·十七）

△在批林批孔中，“四人帮”搞“三箭齐发”，竭力干扰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王洪文、张春桥当时遥控指挥，破坏上海警备区部队的运动，放出“批林批孔，上海要稳，警备区要乱”的空气，破坏批林批孔，必欲搞乱部队而后快。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中，他们又篡改、歪曲毛主席的指示，大讲“经验主义是主要危险”。

（《文汇报》一九七六·十一·三十）

△江青居心叵测地把所谓反对经验主义材料送到我厂，还让我们翻印。她大说什么经验主义是主要危险，胡说什么“教条主义是少数，经验主义是多数，因为没有文化。”

（《北京日报》一九七六·十一·十九）

△一九七六年四月三十日，伟大领袖毛主席亲笔为华国锋同志写下了“你办事，我放心”。同时，在华国锋同志汇报全国总的形势好，有几个省不太好的情况时，毛主席还亲笔写下了另外两条指示。姚文元不仅亲耳听了华国锋同志的传达，而且亲眼看了毛主席的指示。然而，在毛主席逝世后的第七天，即九月十六日，“四人帮”突然抛出了一个“按既定方针办”的所谓“临终嘱咐”。这个“嘱咐”，引的就是毛主席另外两条指示中的一条，可是一查，内容变了，六个字改了三个字；时间也变了，四月三十日毛主席亲笔写下了指示，竟变成了“临终嘱咐”。“四人帮”控制的舆论班子里这一点说得更明白，请看他们画龙点睛的“发挥”：“社论传达了毛主席和我们永别前发出的伟大号召：‘按既定方针办’”。“毛主席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在考虑方针大计，毛主席的临终嘱咐永远是我们的行动指南”。篡改伪造本是“四人帮”的拿手好戏，这一手在此，真是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解放日报》一九七六·十二·二）

△姚文元亲自指令新华社向各地报纸打招呼，今后一段时间要宣传四方面的内容，其中突出宣传的就是这个伪造的“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

正是在“四人帮”的一手策划和布置下，在他们控制的舆论阵地上，“按既定方针办”的宣传达到了空前未有的规模。仅据北京和上海六种报刊的初步统计，从九月十七日至九月三十日短短的两个星期中，在发表的三百九十八篇悼念毛主席的报道和文章中，宣扬“按既定方针办”的竟有二百三十六篇之多，占百分之五十九；而引用“三要三不要”原则的，却只有二十一篇，只占百分之五点三。对比何其鲜明！“四人帮”在上海的亲信对宣传伪造的“临终嘱咐”不用说是十分卖力，尤为

起劲的。他们一再“指示”新闻单位突出宣传好“按既定方针办”，并亲自作出示范：在九月十七日两报送审的上海一千万人民沉痛悼念毛主席的长篇通讯中，将原标题“世世代代铭记毛主席的恩情，时时刻刻不忘毛主席的教导”，改为“牢记毛主席的亲切嘱咐，捍卫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极其醒目的突出了“既定方针”。自此以后，宣传“既定方针”的通栏标题，一天接着一天；鼓吹“临终嘱咐”的报道文章，一篇连着一篇。在“四人帮”一伙的授意下，诸如“坚决执行既定方针，勇敢捍卫既定方针”等等精心制作的大字标题，日复一日地放在头版头条醒目地位，气焰十分嚣张。

（《解放日报》一九七六·十二·二）

△九月十八日，在北京举行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的同时，各地也举行了追悼大会。华国锋同志在悼词中着重强调了毛主席亲自提出的“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三项基本原则，而根本没有“按既定方针办”的句子和意思。在许多省、市、自治区的悼词中，也突出了“三要三不要”原则。第三天，即九月二十日上午，新华社报道各地追悼大会情况的消息早已截稿，报纸已经准备开印，这时，突然来个通知截稿的电讯稿要进行修改。为什么呢？原来姚文元下了一道黑令：凡是各地消息中没有提到“按既定方针办”的，统统要加上去。结果在几十篇消息中，都塞进了伪造的“临终嘱咐”。

“四人帮”手段之卑鄙，行为之无耻，实在令人发指！

（《解放日报》一九七六·十二·二）

△十月二日，在一个文件的批示上，华国锋同志戳穿了“四人帮”的伪造，给了他们沉重的打击。这下，“四人帮”

慌了手脚。狗头军师张春桥连忙表示，“国锋同志的批注，建议不下达，免得引起不必要的纠纷”，江青则划了根线，表示同意张春桥的意见。事后，他们一面阻止下达华国锋同志的批示，一面又用“梁效”的名义，抛出了《永远按既定方针办》的反党文章，杀气腾腾地叫嚣：“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然没有好下场的。”完全是贼喊捉贼，倒打一耙，栽赃于人，矛头直指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妄图把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打成反革命，为他们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扫清障碍。

（《解放日报》一九七六·十二·二）

△毛主席的光辉词作《蝶恋花·答李淑一》，早已为中国和世界的广大人民所熟知和热爱。这首词以奔放的想象，深挚的情感，感动了千千万万的读者。词的第一句“我失驕楊君失柳”，在发表和出版的时候，有一个注释，说明“骄杨是指杨开慧烈士。她在一九三〇年红军退出长沙后，为反动派何键杀害”。这个注释，是经过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审定的。杨开慧烈士为了革命，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伟大领袖毛主席纪念她，广大人民也永远怀念她。杨开慧烈士将与毛主席的词一同永垂不朽。

野心家、阴谋家江青为了篡党夺权，妄图打倒一大批中央和地方的领导干部，诋毁革命先烈，对早已牺牲的杨开慧烈士更是恨得要命。在江青的指使下，出现了骇人听闻的篡改事件。《毛主席诗词》多年以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按毛主席手定的稿本出版。一九七六年五月，外文出版社新出版一种英译本。在这本英译本中，中文本原有的其他条目全在，单单删去

了《蝶恋花》一词中有关杨开慧烈士的注释。江青通过亲信，要了一个花招，假称“要把一切编辑加的注都删去”。于是，就在删掉过去外文出版社编辑部为外国读者讲解中文所作注释的时候，故意把这条经过毛主席亲自审定的重要注释也一并砍掉了。经这样砍，英译本中，杨开慧烈士的英雄形象被抹去了，“骄杨”成了使读者不解的“骄傲的杨树”。当年，何键的屠刀杀害了杨开慧同志；今天，“四人帮”的刀笔又妄图从毛主席著作中砍掉杨开慧烈士的形象。用心何其狠毒！

接着，他们又施出了第二招。由江青的亲信出面，要人民文学出版社按照外文出版社的这个英译本，照样翻印，出版中英对照本，向国内广泛发行，企图以英文本取代中文本。当时，我们看到英译本，发现了这个问题，就按出版工作常规提了个意见：这条注释必须恢复。因为这是由中文译成英文的书，一切译本都应当尊重原作。而且人民文学出版社过去出的《毛主席诗词》，已经印了上千万册，都有这条注释。这个中英对照本，单把这条注释删去，是完全错误的。

于是江青及其亲信又拿出第三招，说这次要出版的是英汉对照本，应该以英文为主体，中文（毛主席原作）是只供对照的。他们又说这种英汉对照读物，过去商务印书馆曾经出过不少，这次仍由商务印书馆出，就不会发生人民文学出版社前后两种版本矛盾的问题了。这样，在今年九月毛主席逝世之后，这个被“四人帮”作了篡改的《毛泽东诗词》就出版了。

砍掉这一注释，暴露了野心家江青处心积虑抬高自己的鬼蜮行径。她为了不让世界人民知道杨开慧烈士的光辉名字，为了想从全中国人民的心中抹掉杨开慧烈士的英雄形象，竟敢疯狂地篡改毛主席亲自定稿的著作，甚至宣称出版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著作，竟然要以他们翻译的英文本为主，真是丧心病

狂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人民日报》一九七六·十二·八）

△大庆明明是在党的领导下，靠学习毛主席的光辉著作《实践论》、《矛盾论》起家的，“四人帮”硬要说大庆是“自发的东西”；“两论”明明是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送来的，“四人帮”硬要追查“是哪个中央”送的；明明是周总理号召大家学“两论”的，“四人帮”硬说此情节是给刘少奇“涂脂抹粉”等等，完全是一派胡言。

（《山西日报》一九七六·十一·二十）

△“四人帮”的黑军师张春桥，曾授意要上海搞所谓“现阶段阶级关系变化”的调查。他的亲信竟叫嚷要写一篇象毛主席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那样的文章，还狂妄地提出什么“张春桥思想”，“第四个里程碑”，“张春桥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等等；他还背着党中央，编写所谓《党史》，为“四人帮”树碑立传，篡党夺权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人民日报》一九七六·十一·二十四）

△张春桥胡说什么：选拔干部的条件是“领导熟悉，群众拥护，上上下下要精干”。这完全是胡说八道，是对毛主席提出的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五项条件的肆意篡改和无耻背叛。

（《文汇报》一九七六·十一·十八）

△省委内的一、二个人同“四人帮”紧密配合，大放推翻中央文件的厥词，公开为杭丝联的那个坏人翻案，为“双突”

的错误翻案。胡说什么“省委关于处理‘双突’问题给中央的报告有错误，可以批么！”还说什么“不要叫‘双突’了，叫新干部、新党员”。省委内的一个人还全盘否定去年下半年温州的大好形势，他说：“什么高屋建瓴，新官上任三把火！”真是恶毒之极！“四人帮”秘密下达黑指示，省委内的一、二个人就阴谋策划，竭力煽动，一时间，温州那股翻中央文件的案，破坏大好形势的妖风甚嚣尘上，在五马街闹市区公开张贴出了反动大字报，攻击中央文件是一个“反革命修正主义纲领”。真是反动透顶！在这股歪风的影响下，有的地方正在举办的学习班，被说成为“集中营”，被迫停办；有的专案审查的材料，被说成是“黑材料”，被迫封存；有些被拘留的罪犯，被说成是“政治迫害”、“打击新生力量”，不明不白地放了出去。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志气。

（《浙江日报》一九七六·十一·三十）

△那个政治流氓、反革命阴谋家王洪文在发展党员问题上就说过：“我看发展一百个党员中，有九十個好的就行了。”他们肆意篡改毛主席的建党方针，不是在斗争中积极而又慎重地发展党员，不是按照党员标准成熟一个，发展一个，而是大搞“以帮划线”，任人唯亲，大搞“双突”（突击提拔干部、突击发展新党员）。凡是“造反早的”，观点和他们一致的，不管这个人的社会关系如何复杂，个人政历有何严重问题，都可以拉入党内。当这种做法遭到广大党员、群众反对时，他们又采用遮人耳目的手法，来欺骗群众，欺骗组织，搞什么“飞过海”入党：就是一些有严重问题，本人不够入党条件，在本单位通不过的，就把他们调到另一个单位拉入党内来。再就是“点名入党”，限时限刻入党，压制基层党员的民主权利，千方百计，强行通过。如果你不同意他入党，他们就说你“对老